

同济大学中文系学术丛书

刘 强 / 主编

原诗 第一辑

汉语诗学融通的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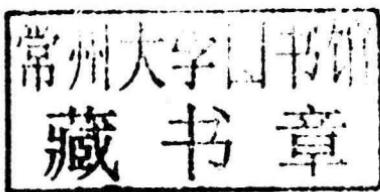
上海书店出版社

同济大学中文系学术丛书

刘 强 / 主编

原诗 第一辑

汉语诗学融通的可能性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原诗:汉语诗学融通的可能性/刘强主编.一上

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2

(同济中文学术丛书)

ISBN 978 - 7 - 5458 - 0986 - 2

I . ①原… II . ①刘… III . ①诗学-中国-文集

IV . ①I207.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94708 号

原诗:汉语诗学融通的可能性

主 编 刘 强

责任编辑 张 冉

技术编辑 丁 多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

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地址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www.shsd.com.co

经 销 全国各地书店

印 刷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12.625

版 次 2015 年 2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5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458 - 0986 - 2 / I.276

定 价 35.00 元

以母语的名义

——《原诗》弁言

当整个时代的知识人，已然自得于从事象牙塔里某一角落的知识生产，“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除了“专业”的研究、“课题”或“项目”的申报与完成，再无多余的精力和兴趣，去关注跨学科、跨专业、跨界的文化创造和颇具超脱性与弥合性的学术探索之时，《原诗》的出现，在有心人看来，恐怕是难免浪漫之讥的。而对于众声喧哗、准的无依、朱紫相夺、“奇葩”如云的当代汉语诗坛及诗学研究界而言，这么一本以“玄学”的超然立场，调和论的折衷态度，旨在引起对话而非冲突、开放而非封闭、彼此互动而非“道路以目”的诗学研究刊物，甚至会引起旁观者义正词严的责难与非议，亦未可知。

然而，真正应该责难和非议的，恰恰是这半死不活的学术体制和画地为牢的学科壁垒！正如刘梦芙先生所说：

学术界受新文化运动激进主义与建国后“极左”思潮的影响，采用二元对抗的思维方式，割裂传统与现代、“旧”与“新”之间的有机联系，凡“立新”必以“破旧”为代价，给几千年文化之传承造成巨大的损失，“代沟”迄今尚未填平。除观念上的误区有待澄清外，还有受现代教育的知识和能力问题。百年来学校教育与科研体制或学欧、美，或仿苏俄，中国统摄子、史与集部的经学被抛弃，传统学术全遭解构，文、史、哲各自分开成为专学，甚至一部文学史亦有古今时段之分，研究者互相隔阂，不通声气。……（《近百年诗词与国学》）

作为学殖深厚的诗词家，刘先生显然是站在“保守派”立场说话的，其观点或有可商，所言却深中时弊。当今之人文学者，学者专家化、研究课题化、学术项目化、学院官僚化等诸多弊端，的确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并呈积重难返、愈演愈烈之势。知识结构的褊狭单一、眼界心胸的局促逼仄，早已使当下的人文学者无论在学术品格还是生命境界，都陷入面墙而立、进退失据、无从转圜的尴尬境地。就诗坛或诗学研究而言，新诗派与旧诗派互不买账，“相看两不屑”，古典诗歌研究者与新诗评论家“术业有专攻”，“自扫门前雪”，早已是不争的事实。环顾海内，很少见到兼擅旧体诗词的新诗人，或者能对新诗报以“了解之同情”的旧体诗词家，至于旧诗新诗并行不悖、双管齐下的行家里手，就更是“不可得而闻也”了。这与上个世纪初，不少新诗人恰是从旧体诗词曲起家，不少古典学者本身即是新体诗人的情况，相去岂可以道里计！

可能很少有人注意到，如此严峻的诗学“分裂”现象，古今中外皆鲜有其例！古代诗歌史上的各种流派固然也有关乎理念和技巧的诸多纷争，有的甚至流于意气，但还都属于诗学共识之下的“内部矛盾”；而当下的这种诗学壁垒，则显然与政治倾向、艺术立场、价值判断、诗性认知等息息相关，几乎彻头彻尾地沦为一种“功夫在诗外”的“外部对立”了。这一点只要从对立双方互相指认对方为“伪诗”便可了然。似乎新诗和旧诗的对立，早已不是诗学趣味和写作形式的分歧，而变成诗与非诗、诗人与非诗人的深闭固拒。最终，器识层面的各行其是，演绎成了“道不同，不相为谋”。

形成此一“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的诗学景观，绝非偶然。揆诸近现代的历史，一个谁都无法否认的事实是：自十九世纪末“西学东渐”以来，面对来势汹汹且处于绝对优势的西学，元气大伤的“中学”在世界范围内，一直处于亟待自证的“他者”地位。与此相应，自“白话文运动”——尤其是对于古典诗歌的三千年传统最具颠

覆性的“新诗运动”——以来，一开始备受质疑的新诗却逐渐取代旧诗，占据了诗坛乃至现当代诗歌史的中心地位。只要稍稍转一下脑子就会发现，“新诗”与“旧诗”的古今角力，事实上隐含着“西学”与“中学”的中西博弈。“新”比“旧”更好，其最为有力的支撑或许是，“西”比“中”更强！这其间，横亘着一个耳熟能详且谁都无法回避的进化论预设——“现代性”。作为文明和时间概念被认知的“现代性”，在多大程度上已经等同于作为地域空间概念的“西方性”或“全球化”，其实是大可重新审视和厘清的一个“问题意识”。

所以，就当代学术而言，似乎没有哪一个学科及领域，像诗歌和诗学这样，充满着古与今、中与西、传统与现代之间拉锯式的巨大张力，凝结着中华文化何去何从的深层焦虑。聚讼与论争就此开始，喋喋不休，永无止息。

吊诡的是，论争的双方似乎忘记了，新诗与旧诗虽然“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其根脉或生成元素却是一个——汉字和汉语。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之家。”既然汉文字没有被钱玄同辈所“废灭”，沦为以拼音文字为主的“世界语”，便是“天之未丧斯文”；既然“斯文”仍在，新诗和旧诗便是比翼鸟，便是连理枝，——“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作为汉语的作者和研究者，我们特别期待看到这么一幅图景：新诗人与旧体诗人心切磋诗艺，相谈甚欢；古典诗学研究者与新诗人相见恨晚，莫逆于心；新诗批评家与旧体诗词家切磋琢磨，疑义与析。我们更希望能看到这么一本书：编者不带成见，不携私心，秉承兼容并包的原则，和而不同的立场，将天南海北，关于古今、中西诗学的不同领域、角度、方法和主张的诗学论文，汇聚在一起，用物理上的“亲密”慢慢消除彼此心理上的“隔膜”，让每一位作者换一种眼光，去正视、打量、揣摩甚至“体贴”不同领域的写作，并由此建立起一种基于“恕道”原则上的彼此的互信与尊重。

一句话，我们试图在古今和中西两个彼此联接而又泾渭分明的维度上，寻找汉语诗学融通的可能性。说得再彻底一点，我们创办这份刊物，不是以学术的名义，甚至不是以诗歌的名义，毋宁说，我们是以历经数千年的风雨忧患而依然“健在”的母语即汉语的名义。

我们试图建构一种新型的对话关系。即剥离各自的专业外衣，直接面对人文学者或知识人必须面对的共同问题，如生命、存在、历史、价值、语言、修辞、情感、自由、幸福……总之，诗歌所呈现及诗人所关心的所有问题，无不涵摄于我们所心仪的理陛对话之中。我们所期待的作者，举凡古典诗学、比较诗学的研究者，现代诗或新诗的评论者，或者兼有诗人、学者双重身份的两栖人物，无论其在读诗、解诗、写诗、译诗的过程中，持何种立场、操何种理论、秉何种价值、用何种形式，都应当达成一个基本的底线共识与默契：我们拥有一条进入诗歌的共同的隧道——汉语。

汉语如此美丽，诗歌如此美丽，关于汉语诗歌的对话也应该优雅而不失风度，不是吗？

其实，这种对话在新诗运动伊始时便已开始。胡适写于民国八年（1919）十月的《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一文说：

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因此，中国今年的新诗运动可算得是一种“诗体的大解放”。因为有了这一层诗体的解放，所以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感情，方才能跑到诗里去。五七言八句的律诗决不能容丰富的材料，二十八字的绝句决不能写精密的观察，长短一定的七言五言决不能委婉达出高深的理想与复杂的感情。

显然，这是针对当时对新诗的质疑而发的。其观点可以商榷，但那一份对于批评者的风度和耐心，确乎难能可贵。这正是魏晋玄学“辨异而玄同”的思想理路，也是古之士君子必备的优雅人格。近百年之后，新诗几乎占据诗坛的中心，而对新诗的质疑依然存在，比如，围绕“懂”与“不懂”：

一些人之所以夸大现代诗的“无标准”而完全忽视了它诗性的追求，显然是一种偏见。至于对旧体诗那些标准的确认，除了存在其合理性的内涵以及它在历史形成过程中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之外，也应当看到，正是由于有这样一种标准的存在，从而是某些根本不具备诗性素质的人，仅仅由于“按图索骥”而写下了大量的“伪诗”。诗歌沦为可以按标准制作的产品，何谈创造精神，何来灵气与诗性？（叶橹：《旧体诗的“懂”与现代诗的“不懂”》，《诗探索》2013年第3期理论卷。）

关于新诗的写作、评论及研究之现状，据我远谈不上全面审慎的观察，目下并未形成一种良性互动、求同存异的氛围，小圈子和各种阵营、门派层出不穷，山头林立，极像是传说中的“武林”或“江湖”。有时候不免让人感叹：新诗的门槛太低了！做一个新诗人太容易了！似乎只要会按回车键就可以！有些诗人，甚至以制造“事件”、炮制“雷语”（耸人听闻之言）来博取眼球，换取人气，殊不知诗歌史永远是优胜劣汰，想要青史留名，要靠诗歌说话，而不是“行为”本身。

相比新诗和新诗人的独领风骚，旧体诗的创作反而被忽视和遮蔽，这与20世纪以来旧体诗词名家辈出、佳作纷纭的事实极不相称。一些新诗人对旧体诗的了解仍停留在“老干体”和“打油诗”的水准，一方面鼓吹向屈原、陶潜、李白、杜甫、王维、苏轼等大师们致敬，一方面又武断地认为旧体诗词已不适合现代生活，“老调

子已经唱完”，而极少愿意放下身段，深入探究一下古典诗词的格律生成、意象编织及气韵意境的营造，对新诗创作的借鉴作用与诗学滋养。其实，新诗也好，旧诗也罢，对于真正的诗人来讲，不过是自己使惯了的“家伙事儿”，就我所知，像徐战前这样出生于1964年的旧体诗人，其在诗歌创作上达到的水准，在旧格律中翻出的新境界，绝不亚于任何一个同时代的新体诗人。从终极意义上说，我们更愿意相信——诗无新旧，只有好坏！

所以，依然需要对话——平情而诚实地对话。我们不拟加入到任何一个阵营，也不愿为任何一种理论或立场背书，我们更愿意跳出彼此纷争的现场，站在为数千年诗歌发展史“立此存照”的角度，观察并且记录过往发生的事，探赜而索隐，钩深以致远，藉以提纯出整个时代的诗歌“精魂”。

现在奉献给诸位的就是一部“对话”的诗学文本。我们绝不敢不承诺篇篇皆是佳作，我们能够保证的是，《原诗》第一辑的作者，绝大部分都是真正热爱诗歌的人。他们在各自领域中的研究和劳作，无疑都应该被尊重。

最后想说的是，这是一本“无中生有”的书。她，终将还会归于无。这世界上，所有信誓旦旦、热血沸腾乃至生死以之的精神创造或文化事业，最终的归宿，莫不如此。看清了这一点，那种大而无当的野心和自以为是的痴狂，就该像冬夜的寒星般，收敛起那原本微弱的光芒。

感谢给了我们灵感的清代杰出诗论家叶燮。感谢每一位为《原诗》的诞生付出过努力的有缘人。我们期待，从2015年开始扬帆起航的《原诗》，可以在诗歌的浩瀚海洋中走得远些，再远些。

刘 强

2015年1月17—19日写于守中斋

目 录

- 1 以母语的名义
——《原诗》弁言

特稿

- 3 亚里士多德的“摹拟”创作论与诗辩 / [台湾] 张汉良
- 25 近百年诗词与国学 / 刘梦芙
- 34 当代先锋诗歌流派谱系考察
——兼论 20 世纪 80 年代诗歌精神的流派学意义
/ 周伦佑

古典诗学

- 45 以神灵的身份回家
——屈原《离骚》末章义证 / 李群
- 66 从民间信仰到文化日常
——曲水赋诗论考 / 刘强
- 83 “杂诗”论考 / 张旭

- 97 隋唐之际的诗律论 / 祁志祥
- 117 奇思壮彩 腾天潜渊
——论常州词派对梦窗词的发掘与推扬 / 周 茜
- 143 刘勰《文心雕龙》体系结构形式的中国来源论
/ 刘 永
- 154 “于野诗会”考 / 朱则杰
- 167 “儿童的发现”
——论明清童蒙类诗歌总集的编纂 / 张 羽
- 176 陈济生《天启崇祯两朝遗诗》研究 / 周于飞

新诗研究

- 191 张力：现代诗语的“引擎”与“枢纽” / 陈仲义
- 205 关于新诗形式问题的思考 / 江锡铨
- 217 蘸取当下，并让过去卷入
——论当代汉语诗歌的现代性 / 胡 桑
- 230 “雾中的陌生人”
——韩东及 20 世纪 90 年代先锋诗歌的某个侧面
/ 贾 鉴
- 246 正义的诗歌
——郁郁诗歌语境中的政治话语塑造 / 古 冈

比较诗学

- 263 袁可嘉的诗论与西方影响 / 廖四平
- 284 文化诗学：中国当代比较文学学科建构的视野、方法与路径 / 方頤玮 方锡球
- 300 从“崛起”到“漂流”
——日本新华侨华人诗歌研究 / 林 邦

诗人观点

- 327 谁决定了你想象的边界？ / 森 子
- 332 现代诗学：无限诗歌的有限侧面 / 董 辑
- 346 不如偏见
——诗歌与时代和创造力的关系 / 冯 晏

诗对话

- 353 汉语中的弗罗斯特
——西渡访谈录 / 西 渡 焦鹏帅

新书评

- 381 “欲纵故擒”与“直言相告”
——读秦晓宇《玉梯——当代中文诗叙论》 / 张光昕

稿约

特 稿

亚里士多德的“摹拟”创作论与诗辩

[台湾] 张汉良

内容提要：本文以经典重读的立场出发，透过晚近摹拟论式微后的文论范式，再度介绍西哲亚里士多德的《创作论》，对摹拟论的理论背景和后世发展作了一个历史性的回顾，进而爬梳这部作品与柏拉图的互动关系，并藉此澄清某些常识谬见。在古典学术式微的今天，笔者希望学界对“原诗”的关注能产生启迪作用。本文主体分为三部分，分别交代《创作论》的背景，阐释摹拟论的起源和发展，并举例说明《创作论》和“诗艺”及“诗辩”传统的关系。

前言：从 1970 年的结构诗学谈起

在重读亚里士多德《创作论》(即俗称与讹称的《诗学》)之前，请容笔者讲一个当代诗学交流史上的小故事，作为开场白。20世纪70年代，和托铎洛夫(Tzvetan Todorov)一齐推动结构诗学的热内特(Gérard Genette)在1987年出版的文集《门坎》(Seuils)中，曾追忆当年为门坎出版社筹划诗学丛书的历史因缘。他们推出的第一本书是20世纪40年代美国学者韦勒克(René Wellek)和华伦(Austin Warren)合著的《文学理论》(Theory of Literature)的法译本；第二本才是亚里士多德的《创作论》法

文新译^[1]。热内特说当时编辑们“曾经激辩过”(“de graves débats éditoriaux”)是否应当以《文学理论》为诗学丛书的首发卷。其实，这本英文著作，虽然广为北美高校的研究生阅读，却无法承担这份为诗学扛鼎的历史大任。热内特辩护说：这本书代表“某种文学理论”(une théorie de la littérature)，而非大写“T”字母的、“总体的”或“唯一的”“文学理论”(la Théorie littéraire)。令人尴尬的是，《文学理论》后来出版时的法文译名仍然是字母大写的 *La Théorie littéraire*(《文学理论》)。可见法美文学交流史上也不乏人情关系的产物(Genette, 1987: 84)。

我们并不需要还给亚里士多德一个公道，学术史是最好的证人。学术前沿的《门坎诗学丛书》标榜跨出门坎，走向未来，但是为何采纳一本最古老的文学评论呢？三位主编除了上面提到的两位外，还包括日后以女性主义著称的哀累尼·西克苏(Hélène Cixous)，他们之所以推出亚里士多德《创作论》的法文新译本，附有400页的注疏，其实是企图透过结构诗学和符号诗学的理论框架，将这部西方诗学经典再度介绍给世人^[2]。因此，笔者认为我们有必要作经典重读的工作，“再度”介绍这位西方文艺理论开山祖的《创作论》，并藉此机会澄清一些常识性的误解。首先，我们需要为“诗学”正名。

一、为《创作论》再正名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年)的生平，一般参考书籍都

[1] Gérard Genette, *Seulls*, Paris: Seuil, 1987, p.33, 关于《创作论》的结构诗学新解，另参见 Lubomír Doležel, *Occidental Poetics: Tradition and Progress*. Lincol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90, 11—32.

[2] Aristote, *La Poétique*, Texte, traduction, notes par Roselyne Dupont-Roc et Jean Lallot. Paris: Seuil, 1980.

能找着，不用在此重复。在希腊末期《创作论》文稿已经失落，连罗马的博学鸿儒西塞禄（Marcus Tullius Cicero，公元前 106—前 43 年）也未曾得窥原貌，直到公元 9 世纪的叙利亚残本出现，10 世纪此残稿的阿拉伯文译本问世，辗转到文艺复兴两个主要抄本出土，《创作论》研究才开始有生命。和《创作论》有关的，但迄今仍然属于悬案的是：这份失落了一千年的作品，究竟是亚里士多德的长期的研究生涯中什么阶段的作品？完成于他早年在柏拉图学园就学时代呢？还是他重返雅典后，自己创办书院时？我个人赞同后面一种说法；但是在没有定论的情况下，我把创作年代定得比较宽松，介于公元前 360—前 320 年之间。

从事文献学研究的人会认为，作品年代不能确定无疑会影响到对作品意义的诠释。我可以想见的至少有两个主要的问题。其一是关于“诗辩”的当时的“历史性”，亦即《创作论》作为对柏拉图在《伊昂》、《理想国》和《法律篇》等著作中抨击诗人的回应与反驳；其二是关于《创作论》的知识系统定位。《创作论》作为“诗辩”文类的鼻祖，启发了后世许多类似的作品；在英国文学史上较著名的例子有 16 世纪诗人席德尼爵士（Sir Philip Sidney，1554—1586）和 19 世纪诗人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1792—1822）的同名论文。说穿了，一部诗史无非就是诗辩史。无可讳言的，任何一个文本必然有它产生的各种动因；但是如果我们把时间拉长了来看，而视“诗辩”为某种普遍的文类与修辞，实证性的史实也许可以暂时退位。

我认为第二个问题，即《创作论》的知识系统定位问题尤其重要。这个问题也可以分两点来谈：首先，《创作论》在被后世命名的“亚里士多德总集”（Corpus Aristotelicum）中的地位；其次，亚里士多德于公元前 347 年离开雅典后，于前 335 年重回雅典之前——这些争议性的编年系大致重建，曾多年在小亚细亚的阿索司（Assos）